

王传英：为核工业默默耕耘的孺子牛

○赵维志



2024年，王传英学长与夫人赵维志获得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纪念章

2025年10月17日，中国核学会原秘书长王传英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曾经靠摆书摊交学费

王传英童年丧父，靠母亲及继祖母抚养成人。他在上海中学上学时，常靠寒暑假在路边摆书摊的收入交学费。1946年，他被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三校同时录取。最后，他选择了清华大学电机系。

1950年，王传英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统一分配到中科院数学所计算机小组。该小组由华罗庚教授领导，只有三人，即闵乃大、夏培肃、王传英。

1955年，在留苏预备班结业大会上，喇叭里传出了“王传英，外面有人找”的叫声。王传英连忙出去，原来是组织要调他到建筑技术局（即后来的二机部、现在的中核集团前身）工作。那年，毛泽东主

席提出“中国也要搞原子弹”，于是401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钱三强开始招兵买马，组建队伍，凡是被点名的同志，各单位都大力支援，开绿灯放人。

参与“一堆一器”建设

1956年，为了到苏联理论与实验物理研究所学习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成立了实习小组。在这个小组里，物理线有何泽慧、黄祖洽、钱皋韵、杨桢，化学线有刘允斌、朱培基，反应堆线有连培生、胡华旦，加速器线有力一、王传英、谢羲等人，为日后401所建造“一堆一器”做准备。

1956年，“一堆一器”在北京郊区坨里开始选址动工。工地上，草房、土坯、风沙、黄土、碎石、野草一应俱全，就是没有厕所和自来水。工地上召开了甲、乙、丙（原子能院、土建、安装）三方誓师动员大会。工地上大家争分夺秒，热火朝天。

人们到坨里的小火车站把一箱箱仪器、器材拉到北区（工作区）。当时，周末进城的班车是绿色军用卡车。冬日里风雪交加，卡车回到南区（生活区）时，手套都被冻在军车的铁栏杆上。

1957年，我和王传英结婚了。当时，床一拼，被子抱一起，公家又发了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个书架，墙上贴了个“囍”字，桌上放满了花生、瓜子、糖和水果。大家要我俩交代是怎么认识的，怎么好起来的。

□ 怀念师友

我说：“他清华大学毕业，是党员，学习好，高度近视眼，爱吃甜，也能吃苦……”王传英说：“她是学俄文的，但为了干好工作，猛补夜大核物理专业……”

1958年，“一堆一器”建成典礼好不热闹，不但有领导同志，梅兰芳先生也参加了庆祝剪彩大会。

事无巨细始终坚守

1964年，我和王传英同时下放到河南信阳，大女儿已经8岁，交给热心的邻居穆建华夫妇代管了一年。1969年底，我们全家搬到了湖北潜江五七干校。有一次，王传英扛着铁床走在泥泞狭窄的田埂上，跌倒了再爬起来，但这也锻炼了他的臂力和腿劲。

1971年，我们从干校回到原子能院。王传英担任201室主任，还负责党支部工作。他要确保回旋加速器的正常运转、二室的核物理实验能顺利进行。除了行政组织工作外，他还要学习核物理知识。

老同志们都很喜欢王传英这种积极努力的少壮派科技人员。王传英担任401所常务副所长以后，为了让王淦昌、汪德熙、戴传曾这样的老专家能更加集中精力搞科研，尽量揽下了其他工作。我常听到老同志们说，传英同志，你给我把这事儿搞好、把那事儿揽下来吧。他经常下班回家刚坐下来准备吃饭时，就有人因调动工作、自来水管有问题、污水漏了等事情来敲门。等问题谈完，已是该就寝的时间了。有时候，他刚放下碗筷就又去开会学习、听汇报。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

和孩子们忙着搭建防震棚，需要把塑料布往树上绑，但是树太高又绑不结实。后来又下起了倾盆大雨，我还要回楼里抢着煮几个鸡蛋。而此时，王传英与任和等人守护着反应堆和加速器，彻夜不归，保堆不漏，保器不出问题。

曾任中国驻 IAEA 代表团团长

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国参观原子能院，就是王传英接待的。当时，经常要把钱三强先生请回来接待外宾。每次他回来就戏称：“我又回来客串了，哈哈。”

后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希望调王传英去参加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找他谈话的人甚至从北京房山的坨里一直追到西城区南沙沟，而且高能所给出的条件的确有些诱人。当时，张文裕教授正准备带人赴美国调研，购买串列加速器，又点了王传英的名字。最后，王传英还是决定留在原子能院，搞好大后勤工作和静电加速器的研制工作。

1982年，王传英被调到核工业部科技核电局担任局长。1987年，他又以公使衔参赞身份任我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代表团团长。



1975年，法国原子能代表团参观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排左6为钱三强，后排右4为王传英

1990年回国后，王传英被任命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及中国核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秘书长，直到1999年70岁才正式退休。

“叫孩子的妈妈来”

王传英在20世纪70年代就获得了科技特殊贡献津贴。2024年，他又获得了中核集团颁发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纪念章。

有一次，在提名推荐院士时，评委们在讨论中疑惑，王传英到底是行政领导、高工、专家，还是外交官？结论是：都是，也都不是。我想，他应该是那种为核

工业默默耕耘的老黄牛。他服从组织分配，是一名工作认真积极而毫无怨言的好党员。

王传英热爱生活，平时注意锻炼身体，曾爬过香山鬼见愁，到玉渊潭公园划过手桨船，到紫竹院公园穿过竹林漫步。生病以后，他每天坐轮椅到院内晒太阳时，还一定要下轮椅推着走几步。

去世前，王传英在医院对护工说：“叫孩子的妈妈来。”我好不容易等到次日下午医院探视时间才赶到病房。王传英看见我后笑得如婴儿般甜美。他用手摸了摸我的胳膊，但已经不会说话了。然后，他闭上眼睛安静地走了。

（转自“中国核工业”，2025年11月28日）

钱锡康：清华精神的具象化

○李树勤（1970届水利）

钱锡康老师匆匆地走了。

他甚至没有给我们去医院探视的时间，更没有留给我们作最后一次告别的机会——他捐献了眼角膜和遗体，彻底为党和人民献身了。留给我们的只是由衷的敬



2009年，钱锡康老师（左3）、李树勤老师（右3）赴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看望魏华伟校友（左2）

佩和无尽的思念。

如果对钱锡康老师做个评价，我认为将他的一生概括为“清华精神的具象化”，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具象化比文字表述更鲜活、更打动人。站在我们面前的钱锡康老师，是一位具体的、典型的、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迪的清华人的形象。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道理。

钱锡康老师1953年考入清华时，恰逢蒋南翔校长刚刚主校清华。从当学生到毕业后做教师、干部，他经历了蒋校长领导清华整整14年的全过程。可以说，他的成长成才就是蒋南翔教育思想的人格化。

首先，他是“又红又专”的典型。他入学不到三年，就在蒋校长创立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培养下，在政治思想上登上了“第三层楼”，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